

一、“耕读世家”的“忧国子”

(1899~1914)

(一) 读书人家的长子

李立三祖籍湖南省醴陵县。李家是醴陵县的大族。这个家族自认是老子李耳的后代，祠堂里供奉着远祖李耳的神位。大约在太平天国年代，李家开始衰落，李立三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分家，祖父李运吉那一代进一步分家，形成了众多分支小户。李家各宗支贫富分化，但直到解放前夜，李家祠堂仍有土地 150 余亩，每年收租百余石，除祭祖开销以外，所余还可分给各支若干石，或资助贫困后代读书，由此可见当年李家的势派。李家族谱未见有当官的记载，但李家重视文教，早年就办有李氏族学（民国时期称“蟠根小学”）。族中读书人颇多，李立三祖父三兄弟，就有两人是秀才。李立三的父亲李昌硅（李镜蓉）是晚清最后一次科举的秀才。因此李家自称是“耕读世家”。但是，李家毕竟是“中道衰落”了，李昌硅时虽有少量祖传的土地和较大的宅院，还有 20 余石租谷的收入，但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一生以教书为业。一些老农回忆，解放后土地改革，本应划李立三为“小土地所有者”，但照顾他们是革命家庭，划为贫农。

醴陵地处湘江支流的淥水之滨，是湘东重镇，省会长沙之门户。封建时代这里素以“政教发达”著称，历史上封建王朝在这里都设置州或县级政权。这里风景优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盛产稻谷，还有以陶瓷、夏布、爆竹焰火三大名产为主的发达的手工业。尤其是陶瓷生产久负盛名，景德镇的瓷业原本是以醴陵所产的陶土为原料的。后来熊希龄在醴陵创办瓷业制造公司，这里的陶瓷业发展起来，尤其是粗瓷生产，销路极广，驰誉中外。因此醴陵是湖南最富庶的县份之一。

在李立三出生的前一年，晚清“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在醴陵东七八十里远的江西省境内的萍乡开办了安源煤矿。接着又以连接汉口、大冶、萍乡三大工矿基地，运送煤炭供汉口钢厂为目的，修建了株萍铁路。1903年，这条铁路建成通车。于是，封建时代停滞不前、富庶而又沉睡的醴陵，迅速改变着它的面貌。这里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开始大量外销，经济有所发展。由于交通的开发，国内外一些新的政治文化思想也传播了进来，大量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到安源煤矿去做苦工。于是，这里又成为官僚、买办、军阀和冒险家们追逐财富的地方。工人、农民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洋人对中国人的奴役已经不是传闻，而是这里人民切身体会到的事情。人民群众日益贫困，无法生活下去。祖国的命运使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从康、梁到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在这里传播开来。从前，醴陵很少有值得称道的大事和名人，但从本世纪开始，这里就不断出现震动中外的革命风暴，成批的风云人物

也在这里产生出来。宁调元、刘道一、蔡绍南、程潜，都是辛亥革命前后在这里出现的革命英雄；另外，像何键、陈明仁、廖耀湘、刘斐、李明灏等国民党军政要人或地方名人、开明人士，也出生在醴陵。20年代前后，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从这里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李立三就是醴陵出生的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其他如左权、耿飚、朱克靖、刘型、杨得志、宋时轮、张子意等等。

李立三家住阳三石的福建围，地处醴陵县城的东南角，背后有清澈的渌水向西流入湘江，门前有株萍铁路连接着长沙和萍乡。走出家门到醴陵火车站也只有10分钟的路程。这是一座有10余间房屋的宅院，大门有李昌珪所提的“芋园”二字，两边有配联，上联是“日升月恒”，下联是“春华秋实”。宅院是典型的湖南形式。门前有一面水塘，四周是一片片葱绿的稻田，很富于读书人的田园意趣。满载煤炭的列车不时从这里隆隆驶过，虽然破坏了原有的宁静，但也给人们带来许许多多开阔眼界的新事。

家乡的优美环境，为童年时代的李立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他能够畅游和玩耍，并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那筑在渌水之上的壮观的石拱桥，还有那桥下不远处著名的状元洲，以及宋代理学家朱熹讲过学的“朱子祠”^①，父亲都带他去过多。这使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热爱自己的祖屋。但是，他也时常站在高处凝视着巨

① 宋儒朱熹曾来此讲学。为了纪念和宣扬儒家思想，醴陵人建了朱子祠。房前有一池塘，起名“瑞绿池”。据说是朱熹洗砚的地方。此为“醴陵八景”之一。

大的钢铁之龙奔驰在望不到尽头的铁路上，这唤起了他幼小心灵的许多幻想。

李立三是家中的长子。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家里栽植的一株凤尾蕉（俗称铁树）开了花，这是百年不遇的事情，父亲认为是吉祥之兆。因而他一生下来，父亲就认为这吉兆就是这喜得贵子，于是就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凤生”；因此，家乡晚辈亲朋后来称他“凤叔”。母亲担心他养不活，又给他起了个带有迷信色彩的“狗妹子”的小名。其实李立三体质极好，不仅青少年时期茁壮成长，还经受住后来革命活动中的磨难及苏联监狱中的残酷迫害。

（二）一个活泼好胜的少年

李立三的父亲是一位受过严格教育的“温文尔雅，态度严肃”^①的知识分子。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能光大门楣的“科目中人”^②。但是，他忙于私塾的教学工作，对幼年时代的儿子，无暇加以管教，甚至很少同儿子接触。

李立三最初的教育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母亲何氏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很喜欢自己的长子，从他一懂事，就给他讲了许多民间传说的历史和文学的故事。诸葛亮、岳飞的故事，他知道很多；《水浒传》、《聊斋志异》和一些武侠小说的故事，他也有深刻印象。

此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对李立三父亲的描述。

^② 中举的人称“科目中人”。李昌珪认为中举才是真正的光荣。

李立三在这种情况下，从小就违背父亲的意愿，成为一个活泼、好胜和爱打抱不平，甚至有些调皮的孩子。弟弟妹妹们回忆起来，总要谈起他儿童时代的一些恶作剧。李立三有个远房婶娘是后娘，时常虐待她的前房遗女。李立三决心给这个小堂妹打抱不平。一次，他声言要讲三国故事。邻里妇女小孩向来喜欢听他讲三国，他的婶娘和其他人都来了，他就开讲了。但他讲了一段三国故事后，就换了题目，讲了一个后娘虐待子女不得好报的故事。婶娘听出了他的用意，尴尬之余，恼羞成怒，就拍桌打凳闹了一场。但她从这以后再也不敢打骂女儿了。又一次，小朋友报告李立三，说邻家一个不正派的女人，把一个男人招进房里。李立三把皮球打进这家的窗子，然后敲门要求进屋找皮球。他进了屋专门到藏人的地方找皮球，结果硬把屋里藏着的人给找了出来。

母亲不仅喜欢李立三，而且很相信他。李立三的一些调皮的事情都得到她的宽容，一直到他被戴上“红匪”的帽子，遭到悬赏通缉，父亲骂他不走正道自投死路时，她还是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坏事。她总是反驳丈夫的话，说儿子是为穷人翻身才去干革命的，穷人是拥护他的，就是搭上了性命也值得。

（三）启蒙教育中显露出才华

父亲对童年李立三的调皮性格逐渐有所察觉并且很是反感，认为应早日严加管束。刚刚 6 岁的李立三就被关进蒙童馆里去读书。李立三

记忆力很强，先生给他指定的书，他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背诵下来。最初，蒙童馆里的管束并不严格，背书余下的时间他不是淘气就是读“杂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还有一些其他民间流传的野史和演义，都是他在私塾期间阅读的。他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父亲多次发现和处罚他，最严重时甚至罚他跪板凳。但是，这些惩罚并没能禁绝李立三读“杂书”的活动。父亲用加大背书分量的办法，使他很快读完了启蒙书籍，也很早读完了四书五经。后来又让他背唐诗、写联句，甚至指定题目和格律，限定时间，让他写出诗词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想把他引到读书“正道”上来。这种家庭作业一直没有间断。

后来，废科举、兴学校之风终于吹进了醴陵。那些守旧的顽固派抵挡不住这股强劲的新势力。于是在一片摇头叹息声中，赫赫有名的“朱子祠”改成了第一所县立初级小学，渌江书院也办起了渌江中学。李立三在朱子祠读私塾，又在原地转入小学，但他没读完小学就跳格进了渌江中学。在这所新式的学堂，他还要每天读着父亲给他指定的古书。他不仅读了许多文选和诗集，还读了一些像《资治通鉴》、《墨子》等经史著作。尽管李立三仍是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但也在父亲逼迫下，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底子。青少年时代所写的诗词，他自己收集起来，订成了厚厚的一本《芋园诗草》，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才丢掉了；从一些能找到的诗作和诗句，也能多少看出他少年时代的思想和才华。李立三的两个儿子都记得，祖父时常拿出父亲读过的书指给他们看：“你们看你爸爸在 12 岁的时候这部《通鉴》就圈圈点

点地读了两遍。’^①

（四）英烈事迹震动了童心

李立三 7 岁那年（1906 年），同盟会的刘道一、蔡绍南和会党首领龚莼台等人领导了震动中外的萍、浏、醴起义。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很多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捕杀。但是这次起义的影响却长久地留存于醴陵人民中。一些同盟会员在革命失败后，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李立三读私塾的学馆中，就有一个比李立三长 9 岁的、名叫孙小山^②的‘坐间学生’^③，他时常利用课余散步的机会给李立三等几个蒙童讲革命故事。李立三就是从他的口里第一次听到了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李立三后来回忆说，孙小山慷慨激昂的讲述，“极大地震动了我刚刚八九岁的童心”^④。因此，李立三从小就对秋瑾烈士极其崇敬和景仰。孙小山把秋瑾烈士 1905 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时所写的一首著名的言志诗介绍给李立三，并且详加讲解，使他十分感动，自然成诵，终生不忘。这首诗是：

① 李人俊的回忆（记录稿）

② 孙小山（原名孙筱山）是醴陵县革命先驱、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约在 1925 年加入共产党。1927 年初曾经陪同毛泽东考察醴陵县农民运动。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提到的带领农民打菩萨破迷信的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 年被国民党杀害。

③ 私塾里在单独房间里读书的年龄大的学生叫“坐间学生”。

④ 李立三：《读访秋瑾故居以后》。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风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涛难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50 年后的 1960 年，李立三到杭州出差，还特意前去拜谒了秋瑾烈士墓，然后步秋瑾原韵，和了一首七律：

岂是天姑天外来，一声叱咤胜风雷。
同胞四亿初惊醒，枷锁千年难化灰。
堪叹神州遭厄运，又惊巾帼出天才。
今朝胜得东风劲，扭转乾坤此一回。^①

李立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实现烈士们“力挽乾坤”、改造中国的遗志而奋斗。这成为他不断前进的动力。

孙小山还向他着重讲解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要内容，使他受到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孙小山还把当地会党所编的以反满革命内容取代旧式猜拳口令的新口令教给孩子们：“汉人强，满洲亡”（用以代替旧口令的开头令的“福寿全 全福寿”）；一独立 二民权 三维新 四百兆 五大洲 六君子 七战士 八旗劣 九十九（借用刘伯温《推背图》中‘手拿钢刀九十九，杀尽胡虏方罢手’之意），排满（用以代替没有政治内容

① 李立三：《谒秋瑾烈士墓有感》。

的‘全来了’的‘十’”。李立三等一群活跃的蒙童就用这些口令猜拳，通俗地传播了同盟会的革命口号。

李立三一直认为孙小山是他最早的民主主义启蒙教师。1954年5月，李立三建国后惟一的一次家乡之行，还特意找到涪江中学读书的课堂（后为国民党的司法处），向随行人员指出这是孙小山烈士牺牲地，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五）忧国子‘抱负’

由于辛亥革命脱离群众和不彻底，它很快爆发，也很快失败了。令人极端仇恨的清朝统治是怎样被推翻的？这件大事没有给少年时代的李立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开始的军阀混战和它造成的深重灾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醴陵是湖南省的一个富县，这里税收额很大，又地处交通要冲，因而成为所有在湖南进行的军阀混战的必争之地。内战就像拉锯一般，今天“北军”打来，明天“南军”打去。这些兵匪不分的军队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在一份方志里曾经对醴陵的兵灾作了这样的记载和控诉：“4月17日（南军）首将城中财货钱帛，掠掳一空，复将房屋桥梁，烧毁略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日暗天昏，神号鬼哭。迨至翌日晌午，火势始灭……乃至5月7日（北军进城）重燃劫火，大肆诛屠。万家无雉堞之遗，四处有焦伤之骨。延烧十里，火达数朝，邑城既空，乡僻又起……所有庐舍大半被毁，财物金帛，糜有子遗，

掘地及泉，室无完土，即所不欲，必毁碎而弃置之。田畜家禽，不遗飞走。摘瓜尽蔓，采葵连根……杀掠之余，继以淫逼。夫涪于侧，气未绝而尚见其妇之含冤；子哭在旁，声已嘶而无救于其母被玷……县（城）战事结束之后，仅余二十八人。此二十八人与每人云：我等妻离子散，骨肉分离，零丁孤苦，并不想活。^①

李立三在这次兵乱逃难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连天烟雾掩峰岗，羁旅怀归百断肠。
乳燕呢喃惊客梦，栖乌群集趁斜阳。
袁山到处篁丛绿，庄埠连阡麦正黄。
漫道桃源多逸趣，应知故国有流亡。^②

兵荒马乱，国无宁日，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使生性活泼的李立三也产生了很大的忧伤情绪。因此中学时代的李立三深受秋瑾的“浊涛难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诗句的感染，给自己起了个“忧国子”的笔名。他的许多同学都记得，他时常以忧国的心情写出对时局的看法和救国的主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壁上，围观的同学总是很多。文章的内容是难以记述了，但是记得同学们都很受感动，激起了广大同学对反动军阀的仇恨，同时也称赞忧国子的文章写得好。

1916年冬，黄兴在上海逝世。在国民党和广

① 《湘灾纪略》，《湖南省志》第1卷第373~374页。

② 李立三一家当时逃亡在萍乡附近的温泉。袁山即萍乡，庄埠即醴陵。

东政府推动下，1917年4月，为黄兴举行国葬，安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上。醴陵虽然比较闭塞和落后，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倒台和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促使人民逐渐觉醒。国民党的威信日益高涨。因此，各公团和各校学生也在兴贤堂举行“遥祭大会”。在醴陵文化界颇有影响和名气的李立三的父亲李昌硅，事先被推举为遥祭大会写挽联。他头脑陈旧，又不甚了解辛亥革命和黄兴业绩，因而苦思苦想也写不出来，十分为难。这时他忽然想起“忧国子”文章受欢迎的事情，于是就商请儿子替他完成这项任务。李立三欣然答应了父亲的要求。才思敏捷、又对辛亥革命和革命党人事迹比较了解的李立三，略加思索，挥笔而就。父亲过目后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就以自己的名义，书写送去。挽联文字和内容已无从查找，但在世的当年醴陵各界人士和同学还都记得，这副挽联贴出后，受到普遍称赞，甚至产生了轰动效应，使李昌硅感到十分荣幸，从此承认了儿子的才能，颇有感触地对知道此事内幕的家人说：“凤生生不逢时，如早生廿年，肯定是‘科目中人’。”

李立三虽然忧国，但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是一个富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色的青年。他的家里有一张他同另一青年朋友的合照，背面有李立三的题词：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①

^① 李人纪等：《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人民日报》1980年7月11日，标点符号是作者加的。

对这段题词，李立三后来作自我批评说：“那个题词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我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后来犯过错误，更是与此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①

李立三批判个人英雄主义是对的。其实，这里最重要的是少年时代的李立三，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听从天命的人。有抱负，这是他性格上的可贵一面。后来他更把这种抱负建立在不怕牺牲，为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基础上，那就成为共产党人不可少的品质了。

（六）初试锋芒 赶走了守旧的校长

在中学，李立三虽然不大用功，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同班同学能和他争高低的只有李明灏一个人。但是，据李明灏自己回忆，他也只有一次考在李立三前面，得了第一名。

李立三除了学好功课之外还读了许多书刊。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著作、“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的文告，他都读过；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也从报纸上看到了，因而懂得不少国家大事，经常讲给同学们听。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所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集体。这个无形的集体都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这个不满情绪第一次爆发冲着校长叶琼（芾棠）。叶校长辛亥革命后虽然剪了辫子当了新式学校的校长，但是他保存了一整套封建思想。他拥护袁世凯，每天坐轿子上班，排挤贤能，任用亲私，贪占公款，并且

^① 李立三给二儿子李人俊的信。

像对待犯人一样苛待学生。李立三带领同学搞罢课，终于赶走了这位校长。

二、“二十八画生”的“半个朋友” 周恩来的老同学

(1915~1921)

(一) 定王台首次会见毛泽东

1915年，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把周围 12 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办成一所省立中学，实际上是十二县联合中学。渌江学校也合并到长沙来了，于是李立三开始来到省城长沙读书。他先在长郡中学，后来又转到广益中学，这时结交的一个要好的朋友，就是浏阳来的罗傲阶（罗章龙）。1917年罗傲阶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结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傲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

李立三接受了罗傲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事先来到定王台，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毛泽东当时和许多提倡新风俗的青年一样，见面不谈客套废话，一句寒暄话也不说，就态度严肃地讲起了对国家大事和读书修身的看法。他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但比李立三大 6 岁。李立三觉得毛泽东已经是一位“大先生”，自己则是一个从县城里

来的“小学生”因而十分拘束，在县城里能知道的国家大事十分有限，在毛泽东宏论面前，自己觉得真是孤陋寡闻。于是，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交谈几句就走开了。毛泽东在回忆此事时说，他的一个征友启事，只得了三个半朋友。李立三就是那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半个朋友”^①。

李立三于 1917 年中学毕业，回乡当了几个月小学教师。这期间他又闯了一次“大祸”。

前几年被他们赶出涪江中学的叶琼，这时又升任了县教育会的首脑，还是在教育界里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疾恶如仇的李立三搜集了叶的大量劣迹，在暑假小学教师会上发表演说，无情揭露了他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了这位“醴陵的绅士”。许多受欺压的教师拍手称快。但是李立三这次“革命”和读书那次是不大一样了，这次不仅没有大群年少气盛的同学支持，还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一些教师认为李立三对叶的指控不无道理，但有些粗暴。连他的父亲（当时任涪江中学的庶务）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二）投笔效班侯”，参加

“最革命”的护国军

县城里的封建压迫使人喘不过气来。李立三决心出走去参加革命军。临行，他留诗一首：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3 页，三联书店 1979 年出版。

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①

他跑到衡山投了当时被湖南人称为“最革命的”程潜^②的护国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由于他有文化、办事勤恳、为人爽快，营连长和普通士兵都喜欢他，不久他就当上了差遣（相当于连队的文书）。一次他去程潜司令部办事，正赶上程潜和一个人下棋。他不便说话，就站在旁边观棋。这盘棋程潜得胜了，但李立三却失声笑了一下，引起了程潜的注意：“你会下棋吗？”李立三连忙谦虚地说：“不会不会！”尽管如此，程潜还是强拉李立三对弈起来。结果大出意外，素称高手的程潜竟输给了这个年轻的士兵，这使程潜大为吃惊，因而问起李立三的身世。程潜发现，他们不仅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还是程潜的“同年”^③。有了这层关系，程潜就对李立三另眼相看了，并且立即把他调来司令部当差。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李立三找来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一些钱，你去北京大学深造。于是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一些地方纸币回了家，然后去北京读书。但是这种迅速贬值的钞票，只能兑换成非常有限的银洋，除去北京的路费之外，就所剩无几了。

① 李人纪等：《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人民日报》1980年7月11日。

② 程潜，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武汉前线的重要指挥者，以后又领导一支护国军在湖南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当时被湖南人看作最革命的人物。

③ 旧时科举同场考中的人互称同年，互相以师兄弟一样看待。

李立三 1919 年春天到北京以后，交不起学费，进不去大学。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发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门路，于是他就去报了名，进了法文专修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这个预备班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只管教课，不管食宿。为了省钱，李立三寄宿在一座寺庙里，每天往返步行 40 里去听课，余下时间就在山寺中念法文。当时，北京城里沸沸扬扬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给李立三很大鼓舞，使他进一步明确了赴法勤工俭学追求救国救民新道路的理想。但是，他没有机会参加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去，只作为同情者阅读当时的鼓动报刊，如《每周评论》、《国民公报》等，思考了许多国事。运动过后，他只好发奋读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很短时间里他就初通了法语准备出国了。

（三）在赴法路上

1919 年秋，李立三的父亲卖掉了祖传的土地 16 亩，为他筹得银洋 200 元作路费，李立三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

10 月 16 日李立三等 48 名赴法学生乘坐的美国轮船“沃隆号”从上海起碇出海了。“沃隆号”是一艘 5000 吨客货兼用船，下舱装货，上层乘人只有 50 多具床位。运送旅客，船内条件比一般邮船的四等舱要好得多。但船只较小，每遇风浪颠摇很大，学生们晕船呕吐十分严重。大约李立三是从新加坡寄回的家信中，有附诗这样写道：